

中国钱币类历史文化文本汉译中的 译者主体性探究

——以《中国近代铸币(1866—1949)——
——来自西方档案的印证》为例

李家坤,赵天晗,李依默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8)

摘要:基于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英文专著《中国近代铸币(1866—1949)——来自西方档案的印证》的汉译实践,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探究了中国钱币类历史文化文本翻译中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以维持生态翻译语境的平衡;如何运用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方法,借助信息增补和词义引申技巧,在忠实原文语言内容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传递源文本的文化信息,以确保源文本的文化信息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同时又能实现原作的交际目的,旨在为钱币类文本翻译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钱币类历史文化文本;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方法;生态翻译语境;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一、文本内容概述

钱币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以笔者参与翻译的钱币类图书《中国近代铸币(1866—1949)——来自西方档案的印证》^[1]为例,对中国钱币类历史文化文本汉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探究。该书是美国钱币研究者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撰于1974—2003年间的论文集,对中国陆续开铸机制币、新币取代旧币的更迭追根溯源,字里行间记录了

钱币变迁承载的历史^[2]。书中所述银圆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

笔者翻译的3章分别介绍了涉及诸多中国抗战重大历史事件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孙中山像“船洋”的铸发过程、记录冯玉祥戎马一生的冯玉祥像“五原誓师”纪念币的来龙去脉以及勾画清末民初历史风云的袁世凯像“袁大头”的兴衰过程。由于理查德·怀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受跨文化交际所

收稿日期:2023-07-0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21BYY029);辽宁省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项目(2021061);2022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项目(即跨校修读学分)(2022041);2022年度辽宁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LNYJG2022243);教育部第二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就业实践实习基地建设)(W20230111965)

作者简介:李家坤(1966—),女,辽宁营口人,教授。

限,英文源语文本除了与汉语译语存在语言差异外,还有多处文化缺失甚至误解。笔者在翻译活动全程发挥了译者主体性作用,既如实传递了原文的语言内容,又弥补了文化缺失或矫正文化误解,向读者还原了某些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及中国银圆的百年铸发历程,实现了原作的交际目的。

二、译者主体性的学理探析

译者主体性是指翻译主体(译者)的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翻译行为,是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理念的体现^[3]。由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构成的生态翻译环境道法自然、优胜劣汰^[4],要在生态翻译环境中谋求生存,译者就要对原文进行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转换^[5],能动性地选择译文、受动性地适应生态环境、为我性地使译文为读者所接受。

1. 理论基础

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依据可追溯至20世纪末的学科交叉融合。首先,西方学者对语言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了隐喻类比,提出了“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又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引入语言研究,建立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尤金·奈达(Eugene Nida)^[6]进一步推动翻译理论研究向语言学转向,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7]又推动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历经这两次转向才衍生了翻译学科。此后,米歇尔·克罗尼恩(Michelle Cronin)把生态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首创了“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8]。在此期间,中国学者祖利军和许建忠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进展,助推了翻译研究向生态学的转向。但是,直到2004年,胡庚申^[9]教授把生态学思想与翻译研究加以融合,以生态视角进行翻译本体研究并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才标志着“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的诞生。生态翻译学理论站在译者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

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作出了新的描述和解读,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译者的主体作用越来越被认可,译者主体性也逐渐成为生态翻译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生态翻译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根基,译文质量高,译者便可生存;反之,势必被生态翻译环境所淘汰^[10]。

2. 特质属性

译者主体性具有三重特殊属性,三重属性相互牵制,才能使译者在生态翻译环境中得以生存。

(1)受动性。翻译主体受限于生态翻译环境,呈现出译者主体性的受动性属性。胡庚申等^[11]认为,“语境”即生态翻译环境,时刻保持着诸元素之间的彼此关照、彼此适应、彼此选择的动态平衡。任何翻译项目都自然生成自己特定的语境,并决定译者的类型和资质。每一个翻译项目的第一项工作都是由语境选择译者,译者一旦被语境所选择,就要适应语境。

(2)能动性。翻译主体一旦被生态翻译环境所选定,他就可以代表该生态翻译环境,即享有来自生态翻译环境授予的主动权,实施对译文的选择,呈现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属性。在选择译文之前,译者既要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又要关照读者的接受程度;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为读者服务^[12]。译者绝不只是听从语境的控制而无所作为,实际上,译者在适应语境中选择译文,在选择译文中体现主体性、能动性和主导性。

(3)为我性。任何翻译行为都以翻译主体的各种目的为指导,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会调动各种能力、采用不同策略来克服翻译中的各种困难,体现译者主体性的为我性属性。笔者在翻译这部带有厚重历史文化色彩的钱币类文本时,为了关照非钱币专业读者群,做了充分的背景知识准备,如熟悉钱币类术语、了解相关钱币知识、阅读并领悟钱币承载的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慎重思考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带有个人色彩的评说能否被

读者接受,对原文原义保留到何种程度,补偿或矫正文化信息到何种程度。译者的翻译活动不再是简单的源语变译语的语言转换,而是维持作者、译者、读者诸要素平衡的整体行为。总体来说,译者只有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主导作用,才能提高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13]。

3.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理论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导各类文本的翻译活动,作为该理论重要术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却并不多见。据笔者统计,近五年(2018—2023年)在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以下简称“北大核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等收录的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不足80篇,其中出现较为频繁的关键词有“译者主体”“生态环境”“适应选择”等(见图1)。但近两年,与“生态环境”和“适应选择”相比,有关“译者主体”的研究呈现下滑趋势,而且为数不多的研究多为理论性研究,结合真实案例的实践性分析更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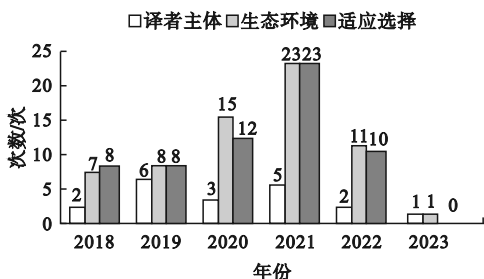


图1 2018—2023年北大核心、CSSCI等收录的高水平期刊上生态翻译学研究中3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

三、译者主体性在中国钱币类历史文化文本汉译中的应用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实现语言维的对应,传递源语的文化内涵,还应关注是否将原文的交际意图最大程度地传达给译语读者。作为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桥梁,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交际成功。因此,译者针对译语生态中的某些欠

缺和不足部分,要做出“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运用信息增补和词义引申等具体操作方法,进行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转换,以达到生态翻译环境的平衡。

1. 信息增补

翻译的信息增补,强调在已有的原文信息基础上,译者通过补充额外的信息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内容,进一步达到更准确、更完整的翻译效果。

例1:原文:Feng Yü-hsiang actually belonged to that slightly unsavoury band of Chinese Warlords who carved up China with single-minded intent during the 1920s. (第37章《冯玉祥像“五原誓师”纪念币》)

译文:20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冯玉祥系彼时四大军阀之一,雄踞西北,手握大军数十万余。

译者作为翻译的枢纽,将源语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读者,有时为了达成原文的交际目的,在信息传递的同时需要对源文本在文化维、交际维上进行处理和加工。读者可以借助译者这座桥梁,与原文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达到文化鉴赏上的共鸣^[14]。1925年1月,冯玉祥赴察哈尔省张家口(今属河北省)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即被称为“西北军”。1927年9月,西北军在五原城内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彼时,西北军人数高达40万^[15]。因此,译文中补充了冯玉祥“雄踞西北,手握大军数十万余”这一历史背景信息,填补了译语读者对此信息的知识空白,对原文未提及的军阀割据的历史环境进行了简单概括,消除了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的疑惑,便于读者领会作者的意图。笔者适应了源语、译语、翻译生态构成的生态翻译环境,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选择在译文中增补信息,丰富了历史文化信息,旨在传递作者要表达的作为四大军阀之一的冯玉祥有权势在辖区内将其画像印刻在钱币上的交际意图,维系了生态翻译环境的平衡。笔者的这种既在交际维度上又在文化维度上的转换体现了译者的主

体性。

例2:原文:It was late into the field of machine struck silver coins as the country was not officially opened to western-style inventions until after the disastrous war with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in 1857—1860. (第38章《袁世凯像银圆(约曼编号329)小传》)

译文:当西方各国相继铸发机制银币之时,视科技发明为雕虫小技的大清帝国选择了固步自封,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天朝上国”方始屈尊降贵、师夷长技。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对译文进行了信息增补,主要介绍了彼时世界各国铸币业争先恐后发展的历史背景,为后文清朝借助西方设备或技术造币做好了铺垫,同时剖析了清朝铸币业远远滞后的原因。结合历史背景来看,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此外,闭塞的封建政治和经济,也使彼时国人与世界潮流相隔绝,不明世界大势。当时,西方各国相继铸发机制币,英国于1842年铸造了“维多利亚铸铜章”,法国铸造了“路易十八5法郎银币”“查理十世5法郎银币”“亨利五世5法郎铜币”等。然而,坐拥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大清帝国,却无视科技的作用和世界的发展变化。因此,笔者在译文中补充了“当西方各国相继铸发机制银币之时,视科技发明为雕虫小技”这一历史语境信息,对原文所蕴含的意义进行了显性表达。笔者的这一操作可以帮助对世界泉史了解有限的中国当代读者减少阅读障碍,有助于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历史信息增补关照了译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度,有助于平衡该文本的生态翻译环境,体现了译者的主动性。

2. 词义引申

在翻译过程中,词义引申是指“根据上下文,不拘于词的字面意义或者词典提供的语义、释义,而对词义作必要的调整与变动”。这就要求译者在理解词语基本义的基础上,根据词语所处的语境及上下文关系,遵守译语的表达习惯,对词语的基本义进行调

整,使得调整后的译文符合原文内容,能够让读者理解译文所传递的语义内涵^[16]。通过词义调整这种语言维度上的转换,实现原作的交际意图,保持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构成的生态翻译环境的平衡。

例3:原文:Feng Yü-hsiang left his imprint on the numisma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 variety of ways, but first and foremost he obviously had his own “fantasy” dollar. (第37章《冯玉祥像“五原誓师”纪念币》)

译文:身为叱咤风云的西北军领袖,冯玉祥留名民国泉史势所必然,冯像纪念(臆造)币便是泉界对其最为珍贵的留念。

汉语中的“泉史”,属于中国古币文化的概念词,指“钱币领域发展的历史”。“泉”与“钱”二字不仅谐音而且意义相通,因货币如泉水一样不断流通,遂古人又将“钱”称为“泉”,用“泉”喻指“钱”。结合文内语境来看,若将“numismatic history”直译为“钱币史”,有些过于直白,不如“泉史”一词具有历史厚重感且易引发读者遐想,呈现财源滚滚的吉祥之意。因此,笔者在深入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能动性,采用词义引申法,将其译为“泉史”,进而保留了该词特有的内涵表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重点关注源语和译语的交际环境,践行主体性功能,具体语境具体分析,选择适应译语的词汇表达,这样才能使读者真正理解原文内涵,实现原作的交流意图^[17]。

例4:原文:The Canton mint was reported as minting dolla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49, including, notably, a 1920-dated Yuan Shih-kai restrike dollar from re-engraved dies. (第36章《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孙中山像“船洋”币模版别》)

译文:1949年下半年,广东厂产出了一批重铸币,出自新刻币模的民国九年(1920年)“袁大头”即在其中。

结合历史背景信息可知,北洋政府为了整顿币制,划一银币,于民国三年(1914年)

二月,颁布了《国币条例》十三条,决定实行银本位制度。1914年12月至1915年2月,先后由造币总厂和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袁大头”是对袁世凯像系列硬币的口语俗称,其全称为“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是民国时期主要流通的货币之一。因此,笔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词义引申法,借用与“袁世凯像银圆”密切相关的人物信息“袁大头”进行代替,突出面值为一圆的银币特征,同时,关照了译语文化中“袁大头”家喻户晓的通俗性,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下选择了最终的译文,使得原文信息得以更加清晰妥帖地表达,便于译语读者理解原文内涵,了解当时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交际意图,适应了生态翻译环境^[18]。

四、结 语

生态翻译学为钱币类历史文化文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运用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转换方法,探析了《中国近代铸币(1866—1949)——来自西方档案的印证》汉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作用。研究发现,源语、译者和译语处于有机统一的生态翻译环境中,翻译过程是译者将文本从源语的语言文化背景转移到译语的语言文化环境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努力突破语言文化差异的限制,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对原文进行再创造,充分协调了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关系。笔者在翻译过程中主动适应、动态调整,通过运用信息增补和词义引申两种翻译技巧,最大程度地传递了源文本的文化信息,同时关照译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度,力争产出高质量的译文。

参考文献:

- [1] WRIGHT R N J. The modern coinage of China 1866—1949: the evidence in western archives [M]. London: Spink, 2012.
- [2] 于放. 理查德·怀特和他的《中国近代铸币(1866—1949):来自西方档案的印证》[J]. 中国钱币, 2013(4): 78—80.
- [3] 刘爱华. 生态翻译学之“生态环境”探析[J]. 东疆学刊, 2011(4): 104—108.
- [4] 武俊辉, 邹霖谨. 关于生态翻译学若干问题的反思[J]. 上海翻译, 2021(5): 17—22.
- [5] 胡庚申, 罗迪江. 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J]. 上海翻译, 2021(5): 11—16.
- [6] NIDA 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7]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8] 胡庚申, 王园.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 定位、内涵与特征[J]. 外语教学, 2021(6): 1—6.
- [9]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0] 胡庚申. 若干生态翻译学视角的应用翻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7(5): 1—6.
- [11] 胡庚申, 李素文. 生态翻译学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比较研究: 再论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J]. 中国外语, 2022(1): 98—104.
- [12] 仲伟合, 周静.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 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7): 42—46.
- [13] 孙琳, 韩彩虹. 《北京折叠》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J]. 上海翻译, 2021(4): 90—94.
- [14] 罗迪江. 译者研究的问题转换与生态定位: 生态翻译学视角[J]. 中国翻译, 2020(5): 13—19.
- [15] 梁艳. 冯玉祥治军研究述评[J]. 西部学刊, 2021(21): 87—89.
- [16] 苏良书, 蒲雅竹. 生态翻译学理论探析[J]. 新西部, 2013(32): 113.
- [17]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 5—9.
- [18] 李家坤, 王蓝雨. 跨文化视角下看“信、达、雅”原则对中国古典外译的指导性作用: 以《桃花源记》3个英译本为例[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6): 620—625.